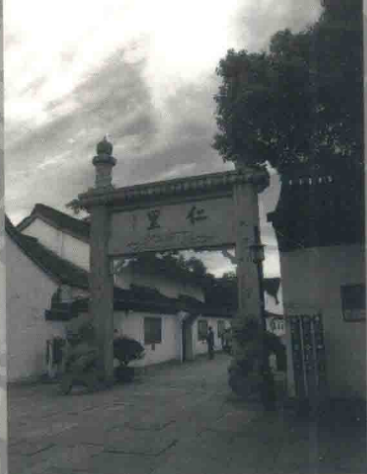




SHAOXING LUXUN YANJIU

绍兴鲁迅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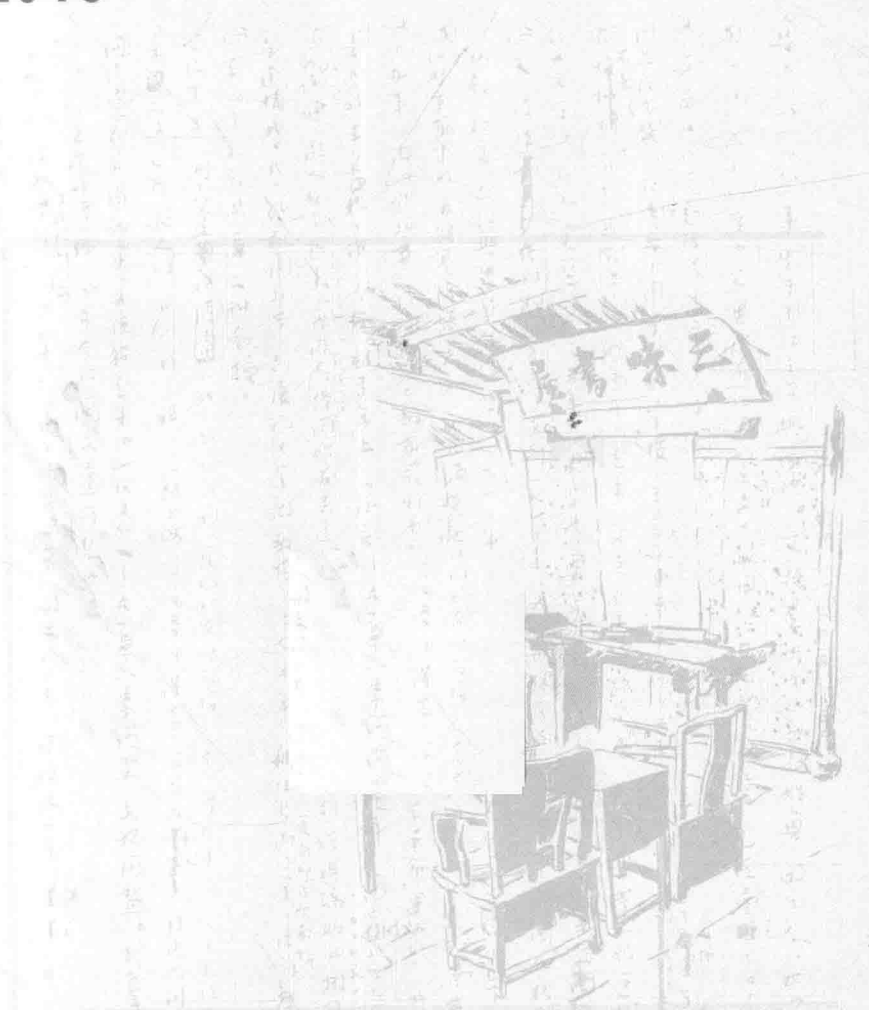
2018

绍兴鲁迅纪念馆 编
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绍兴鲁迅研究

绍兴鲁迅纪念馆 编
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绍兴鲁迅研究. 2018 / 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20-2432-6

I. ①绍… II. ①绍… ②绍… III. ①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文集②鲁迅著作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②I21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6042 号

绍兴鲁迅研究 2018

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章斯睿

封面设计: 陈建明、赵国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 //www. sassp. org. cn E-mail: sassp@sass. org. 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25

插 页: 2

字 数: 17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432-6/K·464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鲁迅思想研究

鲁迅：终生求索人的解放

——以《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为切入点 …… 叶继奋 (3)

“鲁迅文学”的发生与“文学鲁迅”的形成 …… 蔡洞峰 (15)

史海钩沉

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 18 封郑振铎书信考略

(下) …… 葛 涛 (35)

李慈铭、蔡元培与鲁迅 …… 郑 绩 (50)

《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几处错误

——《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鲁迅卷 1—5)》校后记

…………… 谢永兴 (58)

鲁迅与他的乡人补遗(二) …… 裘士雄 (64)

《爱情与自由》之“爱情”及其他 …… 张学义 (75)

名不见经传的黄山鲁迅会议 …… 程致中 (85)

鲁迅作品研究

读鲁迅诗札记 …… 顾 农 (91)

摩罗的神思：《狂人日记》中的神圣、疯狂、宣说、隐默与

“传统自反性”(上) …… 刘 涛 (101)

“十三”：《狂人日记》中的数字密码 …… 沈 杰 (118)

生命的极致的美

- 鲁迅死亡叙事的美学解读 靳之尊 (123)
- 《阿Q正传》修辞探讨二题 邵建新 朱永芳 (129)
- 《孔乙己》琐谈 谷兴云 (135)

域外择枝

- 关于鲁迅对中医中药的看法(上) [日]丸尾 胜 (147)

书评

研究要回到并凸显鲁迅本体

- 读袁盛勇著《当代鲁迅现象研究》 杜 睿 (161)
- 《朱安传》：为无声者发生命之声 任金刚 卓光平 (167)
- “日本鲁迅”的又一新形象
- 评《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池田鲁迅”研究》
- 毛 静 (172)

细致梳理·深刻分析·创新承继

- 评吴金梅新著《鲁迅与明清小说关系研究》
- 徐立平 (177)

画里画外话《野草》

- 评张洁宇著《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
与研究》 崔绍怀 (182)

独特的视角读鲁迅

- 读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何宝康 (193)

百草园文艺

- 在世界的尽头看见你 范玲玲 (199)

三味论坛

“夏目漱石与鲁迅百年对话”研讨会综述	杨晔城 (207)
鲁迅的学生时代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张幸幸 (216)
编后记	(222)

鲁迅思想研究



绍兴鲁迅研究

2018

绍兴鲁迅研究



鲁迅：终生求索人的解放

——以《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为切入点

叶继奋

序，是用来介绍书籍出版的旨意、体例或作者等内容的文字，也包括对作家的评论及与书籍相关问题的研究。因此，借助于“序”，既可以大致了解书籍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可以由此认识作序者对书籍以及相关问题的思想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序”是一个富有价值的切入点。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文学家，鲁迅始终关注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 10 多年所得印象却有天壤之别。国内外宣传资料说苏联“假装面子和专会杀人”，而工人作家所写的《苏联闻见录》，则以自己的耳闻目见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苏联。鲁迅“不加戒备”地读完全书，得出基本印象并欣然命笔为之作序。正面评价寥寥数语：“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1]我们由此切入探索和阐释鲁迅思想。

一、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问题

丸山昇对鲁迅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方面，诸如此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他认为：“人们研讨鲁迅后期思想时，往往只注意他是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什么特点？那对他的文章和行动的影响怎样？等问题。这反映着当时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常常怀有的这种精神态度。”^[2]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的关系”时，他以为鲁迅“不是将自己整个投入其中，也不是相反地全部拒绝，而且他的接收方式也没有陷入浅薄的折中主义，而是成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3]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内涵的理解，从理论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融通相联系的。而“人道主义乃是关于任何历史条件下的最一般、最抽象、最普遍的社会治理原则的理论，因而可以适用各种具体的、特殊的社会，而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形成各种具体的人道主义：它可以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形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形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4]在论及国家的本质定义上，马克思认为，政治和法的理性是国家的本质和基础。“国家既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它的真正社会作用和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应该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即：国家的一个公民。“与国家概念相一致的国家是真正的国家。所谓符合概念、符合理性、符合人性是一致的，因为理性和自由既是国家概念的内涵，又是人的本性的根本内容。”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所要求的国家是符合人性的国家。”^[5]马克思主义在谈到人的解放的条件时，强调“改变现实的人的生存条件意味着对束缚人的生态环境的尽可能完善”。“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为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阐发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认为只有推翻和消灭不合理的剥削人和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

配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6]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得到了实践和成功。《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所谓“所设施的合于人情”,即生活服务、文化教育、组织机构等符合人的常情,满足人的正常需要,包括文中“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鲁迅再次重提苏联小麦、煤油输出以证实其生产力发展的事实,因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保证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真正富裕社会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7],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苏联以事实证明了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这很为关注中国人生存、温饱与发展的鲁迅所折服。此外,鲁迅还对苏联的文化设施得以保存,艺术发展更加旺盛而欢欣鼓舞。这些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不平常的事”,“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的诬陷而言,在鲁迅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帝国主义者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借口。《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所谓“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即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使千千万万的苏联人民挣脱了枷锁,摆脱了奴隶地位,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作为现代国家的一员,获得了基本人权,亦即如马克思所言:“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苏联,“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8]鲁迅对苏联的评价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质内涵与鲁迅有关人的解放思想存在深刻默契。“马克思主义摒弃以人为出发点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但并不抛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的合理因素。”“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包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9]鲁迅的评语简短平常,却句句围绕“人”字,表明他为什么接受以及接受了一个怎样的苏联,读者从中分明感受到他为之欣然的精神内核,那就是:无论哪一种思想理论、政治革命以及社会制度,

都必须满足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这是鲁迅衡量苏联以及一切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准。尽管有一些史料表明,鲁迅也受了第三国际的一些宣传的蒙蔽^[10],人们也曾提出疑问:“鲁迅既然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为什么对‘一党专政’的苏联会抱支持和赞颂的态度呢?”^[11]因为后来大量的反面事实诸如肃反等,与人们最初对新政权的期待大相径庭,这些应该都是确实的。但鲁迅的结论只是建立在他当时掌握的材料之上。鲁迅从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中看到,苏联是一个致力于普罗大众解放,符合人道精神的理想社会。鲁迅的感受是真实的,我们则依凭他有限的文字探索和阐释其思想。“正是在争取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这一政治信仰上面,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使自己的整个思想结构得以进行新的调整和改造。”^[12]

这自然涉及鲁迅的政治立场选择问题。鲁迅为什么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丸山昇认为:“确实,鲁迅在三十年代,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我认为这主要因为当时的情况下鲁迅渐渐承认中国共产党多多少少有改变中国的现实力量。还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几乎没有具有改革中国的政治力量。”^[13]事实上,鲁迅对政治立场的抉择还有其他原因:“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4]。这里所言“事实的教训”,是指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4·12政变”,而这个事件是完全与人道原则相悖离的。鲁迅立场鲜明地站在中共一边:“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15]

二、如何认识鲁迅思想的发展与分期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鲁迅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学术界把鲁迅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普遍以 1927 年分界：由民主主义者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由进化论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以“扬弃”来代替“抛弃”作相对严谨的界定。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往往为了强调后期鲁迅，遮掩或取消了鲁迅的个性独立和人道精神；而为了强调前期鲁迅的启蒙价值，削弱甚至贬低鲁迅对左翼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要么将鲁迅完全定位于一个启蒙文学家；要么将注意力着眼于鲁迅后期与政治相关的文化革命实践；要么将鲁迅描述成一个现代存在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而忽略其对民族历史的承担意识与使命感。这对认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鲁迅不甚适宜，它反映出我们思维方法存在的问题。如何把握鲁迅思想的发展与分期？我们以为辩证的思维方法对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有学者认为，就《破恶声论》而言，“表面看来，这似乎比前一时期如《说钅》之类朴素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要倒退，其实却是为探索国民性问题而迈入历史文化领域的曲折前进。一般论著常把 1903 年就说成是所谓唯物主义，就很难解释 1907 年后的历史唯心主义。”^[16]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思维方法方面的启示。

实现人类社会更加合理地生存和发展，这是由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所决定的，它代表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如何实现人类更加合理的生存并达到一定高度的发展水平，这是一切有使命感和思想深度的文学家思考的重要命题，它也始终如一地贯穿于鲁迅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狂人“吃人”的呐喊震撼荒原，撕破中国文化的黑暗夜空。《灯下漫笔》深刻地揭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吃人”，不利于人的生存的基本事实；中国人丧失了人的权利，沦为奴隶亦即“非人”。鲁迅在解释宗法伦理观念是人沦为奴的文化根源等深刻本质的同时，也在另一维度上证明了“公正”和“人道”是人的合理生存的逻辑起点，表达了“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伟大理想。1925 年，在中国人道主

义文学思潮走向低落,一些曾经热衷于人道主义的作家纷纷离散之际,而鲁迅恰恰是在1925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改良这人生”的纲领性意见,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间隔仅11天以后,写下了《灯下漫笔》。20天之后,再次重申了这三大目标。多年之后,他在“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7]这里所谓“思想革命”“启蒙主义”的本质便是人道主义精神。诚然,纵览《鲁迅全集》不难发现,之后他的思想表述较之以前有很大不同。翻开1930—1931年的《二心集》,“阶级性”“革命”“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黑暗”和“血”等词语如赤色巨浪席卷而来,令人似乎重返充满鲜血和牺牲的历史现场,这也曾经使得一些研究者对鲁迅思想抱持歧见。有学者在谈到“鲁迅这一二十世纪的文学大现象”的继续思索的层面时指出:“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拥抱政治”“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需时间来判断。”^[18]

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鲁迅思想转换的重要契机,促使鲁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有学者统计,在1928年“二百多笔书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文化的书籍就有六十多种”,其中包括《什么叫阶级意识》《文学与革命》《唯物的历史理论》《民族社会国家观》《社会思想史大要》《阶级社会的诸问题》等^[19]。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学说对他思想的重要影响可见一斑。马克思认为,“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共同点”。但在实践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性同它以人为本出发点的抽象原则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与资产阶级这种掩盖其本质的虚伪做法相反,如果“资产阶级把对立阶级化为抽象的人,而无产阶级要求从‘人’的背后看到

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摆脱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历史观,不揭开覆盖在对立阶级之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它只能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能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科学理论。”^[20]对于社会革命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巨大的社会功能,正在于它借助于革命暴力,通过群众斗争的形式,使和平时期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得以解决,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社会革命既包含着破坏,但“革命确实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的发动机,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因此,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1]鲁迅既反对“彼可取而代之”的皇朝更迭式的轮回,也反对“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22]式的纷争,他确信“革命是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但革命的手段离不开武装。“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23]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他深以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24]在面对所谓“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的言论时,鲁迅反诘道:“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鲁迅坚信,消灭阶级进而达到人类大同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必然经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个历史进程。因此,鲁迅不但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谣诼、诅咒予以坚决反击,而且坚定地认为,帝国主义和我们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25]反抗是鲁迅的人生哲学。鲁迅年轻时崇拜勇猛无畏的斯巴达英雄,礼赞多力善斗之摩罗诗人。在一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人道主义”有自己的诠释和批评。“大家现在又在骂人道主义

了,不过我想,当反革命者大屠杀时,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而抗议,又何损于革命呢?……我未见有人道主义者挺身而出的事,但骂人道主义的人们为什么吓得不敢响一声……我想,中国大概并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也的确是无用的。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除非也有刀在手里。”^[26]鲁迅认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争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27]他创造的文学典型狂人、疯子由理性“劝转”到发出“我放火”的怒吼,也表明了鲁迅人道主义思想与革命斗争精神相结合的一贯性以及持续发展性。

在讨论鲁迅的文学转向问题时,有学者看到,“五四”时期,鲁迅创作突出的是“为人生”,以人为主题,反映人的要求,其基本武器是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五卅”前后,现实的严峻形势使鲁迅对“文化启蒙救国论”产生了怀疑甚至绝望,“经历过精神自我痛苦挣扎与个体对于现实当局的抗争,直到出现了作为社会实际运动,社会革命实践力量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这就使鲁迅的精神反抗、个体反抗找到了真正的客观对应物——群体的社会的革命暴力运动,从而实现了超越,也就初步、部分完成了从民主主义、伦理主义经由艰苦的个人抗争和痛苦的精神探索到马克思主义:现代历史主义的飞跃。”^[28]无论是启蒙主义还是历史主义,求索人的解放,争取中国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是鲁迅思想的本质内核,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实现目标的途径或行动方式而已。当然,鲁迅后期有关“人”的概念内涵已由孤立的个体扩大到民族整体。并且,他已找到了实现中国人的解放的革命途径,以及这个“革命”与他所从事的为人生的文学创作手段之间的内在联系。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使得他所追求的“人国”,由朦胧抽象而逐渐清晰具体起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到鲁迅思想的深化与发展。

以上研究表明,尽管鲁迅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但致

力于中国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摆脱奴役境地,进而争得人的地位,是贯穿鲁迅不同时期的一条思想主线。今天,在一些学者看来,如何认识后期鲁迅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特别是参加“左联”之后,“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29]从文字表面看似乎的确如此,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鲁迅思想的深层潜流。所谓“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即指个体的人获得独立人格,在精神层面上自由自主。“马克思主义对他所以富于吸引力,就因为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那是一种反专制反蒙昧的异质的科学理论。”^[30]不但在“五四”时代,初醒的狂人以自己“从来如此,便对吗”质疑几千年文化传统,意图唤醒黑屋子里昏睡的民众,而且在民族内忧外患交迫的年代,鲁迅发出的声音还是“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31]。在专制统治白色恐怖的政治重压下,鲁迅所期望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从自己的喉管迸发出和着生命热血的吼声来。鲁迅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写道:“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使我们感到,人道精神不但从未离开过鲁迅,而且牢牢根植于他的灵魂深处,成为鲁迅的精神底色。鲁迅深知在中国社会改革所面临的传统的沉重压力,“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32]。因此,认为无论爱什么,须具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精神。他对这个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33],这体现了鲁迅终生求索人的解放的坚韧意志。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认为,陈独秀、胡适、鲁